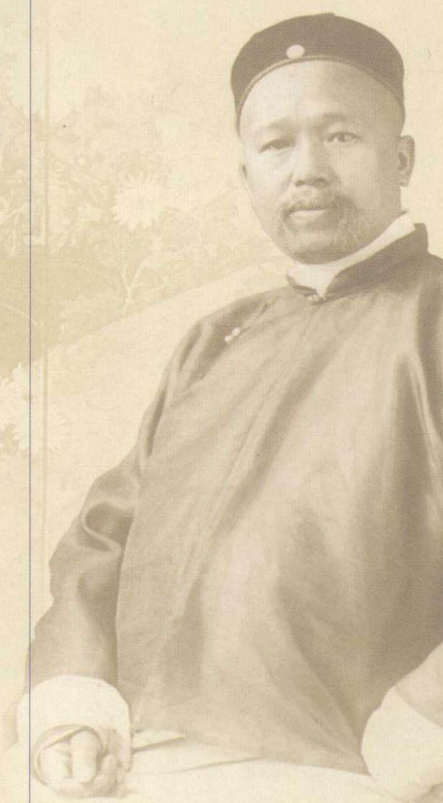


康有为的改革思想 与明治日本

朱忆天
著





康有为的改革思想 与明治日本

朱忆天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朱忆天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09920-3

I. ①康… II. ①朱… III. ①康有为(1858~1927)—
政治改革—思想评论②明治维新(1868)—研究
IV. ①B258.5②D092.52③K31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0316 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林凡凡
封面设计 王小阳

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

朱忆天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25 插页 4 字数 220,000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920-3/K·1766

定价 32.00 元

绪 论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在清朝皇帝光绪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为核心的、寻求全面变革的变法派，在张之洞、文廷式等政权内外改革积极派的呼应之下，推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变革运动，史称“戊戌变法”，改革只持续了103天便告夭折，故又称为“百日维新”。尽管如此，戊戌变法足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其变革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可谓是中国几千年来变法自强运动之最。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的惨败，震撼了长期以来处于“华夷”秩序迷梦中的中国朝野。明治日本取得的惊人成就，促使中国敏感知识阶层的初步觉醒，他们深刻地意识到：经历明治维新洗礼的日本人，其旺盛的斗志、相对完善的近代组织结构，以及文明开化带来的成果，正迅速拉近日本与欧美列强的发展距离。由此，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变法派，开始将目光投向日本，认定其是中国改革的良好典范，并且深信，只要认真总结和汲取明治维新的经验和教训，学会像日本那样卧薪尝胆、不懈奋斗，那么，中国完全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重新崛起，并依托传统文化的优势一举赶超欧美列强。

高举帝国构造改革大旗、追寻中国复兴的康有为，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积极汲取立宪君主制、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等西洋思想和制度精髓的早期代表人物。康有为的明治日本观，不仅仅是他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变法运动指导思想的主干，更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的明治日本观，长期以来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日认识的基础，奠定了中国近代日本观的原型，并且，这一原型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康有为明治日本观的研究，为近代中国其他思想潮流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是全面揭开中国近代思想史变迁全貌不可或缺的重要

一环。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高度关注，并从各种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

有关康有为明治日本观的研究，在中日学界均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中国国内的研究中，往往对康有为的明治日本观不加分析、直接将其视为近代日本的真实图像，并在这一平台之上展开中日近代思想史的比较研究，从而未能深入地剖析其中的文化碰撞，以及在思想摄取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截至目前，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康有为提出的军事、技术、政治、制度等改革方案与明治日本改革方案的比较分析，对康有为提出这些改革方案的根据——即康有为是通过怎样的前提、怎样的路径，才得出这些方案的纵深研究——研究力度依然不够。另外，对于逃亡海外后康有为后期思想的研究，目前研究的主流视角是将康有为定位为逐渐远离中国政治中心，丧失进步性、革新性和昔日辉煌的遗老人物。康有为在流亡世界途中，站在更开阔的观察平台之上，他的改革思想，包括其对明治日本的认识，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同时，康有为的这些新的构思，究竟又对近代中国带来何种影响呢？这些极其重要的课题，均没有得到认真的考察和梳理。并且，从研究方法来看，先前的康有为思想研究，多数拘泥于维新派、洋务派、革命派的简单划分，从思想史高度的俯瞰并不多见。这种单纯的图式研究，不仅抹杀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而且更多地将关注焦点定格在历史阶段的断裂性质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以美国学者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1]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中国“基体”^[2]论为嚆矢，越来越倾向于在中国的内发性和思想的连续性中捕捉历史发展的进程。尽管如此，在历史、社会、思想的流动中，康有为的变革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研究依旧在断裂性和延续性之间摇摆，新的研究框架仍未明确确立。

[1] 柯文：《知的帝国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佐藤慎一日译，平凡社，1988年。

[2] 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

从整体来说，迄今为止对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康有为的明治日本观研究，依旧处于零碎的状态，需要作进一步系统的挖掘。本书为此着眼于以上课题，设定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这一研究主线，全面探讨康有为明治日本认识的内涵、演变及其影响等。

相关先行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关于中日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失败、日本成功”的比较史研究，颇受学界关注，这也在无形中提升了对明治维新和变法运动研究的力度。1955年，中国史学会编撰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全四册)，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奏折25件。1958年，为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其中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奏折300多件。同年，中国史学界在北京召开了“戊戌变法60周年讨论会”，提交了不少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历史研究》上发表，其集大成为《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的出版。同时，侯外庐编辑的《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2]，对戊戌变法的思想和人物进行了深度分析。在这一时期，变法运动被解读为：这是近代中国一场以明治维新为模本的规模浩大的改良运动，在培育资本主义成长这一点上具有进步意义，但是，缺乏民众支持的基础，并对帝国主义抱有妥协性^[3]。

[1] 吴玉章等编：《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58年。

[2] 侯外庐编：《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中华书局，1958年。

[3]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国内有关变法运动的代表性研究著作，譬如，胡滨：《戊戌变法》(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吴玉章等编：《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58年)；侯外庐编：《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中华书局，1958年)；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汤志钧：《戊戌变法简史》(中华书局，1960年)等，基本上就是这样来判定变法运动的历史性格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康有为研究在中国台湾获得深入发展。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篇》、《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等陆续出版。^[1]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彰健、留学日本的许介麟等为代表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论文。^[2]而在中国大陆,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像康有为这样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连坟墓也被砸掉,其思想成为严厉批判的对象,自然无法在学术层面上对其进行客观评价。

1978年年末,中国开始推行积极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国内有关康有为及变法运动的研究,呈现出两大鲜明的特征:

第一,基本文献、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出版发展迅猛。譬如,陈凤鸣、孔祥吉通过挖掘故宫博物院内康有为变法运动的上奏原稿《杰士上书汇录》,证明了台湾黄彰健20世纪70年代指出的变法运动重要的研究资料《戊戌奏稿》曾在戊戌政变后被康有为篡改过这样一个重要事实。^[3]同时,王晓秋在故宫博物院首次发现了康有为的日本研究代表作《日本变政考》的原稿。^[4]依托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大陆学界对变法运动、康有为的明治日本观的评价等,开始逐步摆脱教条僵化的研究模式。

第二,80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国国内掀起了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的高潮。中日两国的改革起点相差无几,均向西洋学习,均由政府发令推行改革,而且,变法运动本身就是视明治维新为学习楷模,两者之间有

[1] 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全22册,(台湾)宏业书局,1976年];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全一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篇》[全二册,成文出版社,1978年];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全一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等。

[2] 黄彰健:《读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大陆杂志》40-1,1970年);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言语研究所,1970年);黄彰健编:《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中央研究院”,1974年);许介麟:《日本と中国における初期立憲思想の比較研究——とくに加藤弘之と康有為の政治思想を中心にして(1~5)》(《国家学会杂志》83(5·6)、83(7·8)、83(9·10)、83(11·12)、84(1·2),1970年9月、1970年11月、1970年12月、1971年1月、1971年3月)等。

[3] 陈凤鸣:《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

[4] 王晓秋:《康有为的一部未刊的重要著作〈日本变政考〉评价》,《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着惊人的相似之点。可是,两者的成果、发展的轨迹和结局却截然不同,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巨大落差,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有关这一课题的比较研究,发表的论文达100多篇^[1]。这些论文,通过对国际环境、经济基础、政治构造、思想体系、民族性、教育水准、社会构造、地理条件、领导人的才干等的比较研究,探寻两国改革差异性的深层原因。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填补了许多尚未涉足的研究领域。

可是,这一时期国内的多数研究,在不自觉中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认为变法派的改革举措是明治维新的翻版,是对明治维新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在没有先行解明变法派摄取西洋及明治日本知识过程的前提之下,很武断地将变法派的明治日本认识全都视为明治维新的真实翻版,而没有注意到变法派在模仿明治日本改革方案时可能产生的认知误差。这样的研究,与其说是通过严格的历史剖析得出结论,还不如说在历史研究之前就确立了“当然的前提”,缺乏分析、批判的力度。

9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的康有为和变法运动的研究,越发活跃,论文的数量、质量有进一步的提高。^[2]在研究资料方面,1995年,中国第

[1] 主要论文包括徐泰来:《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徐新吾:《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张凤琦:《对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成败的一点看法》(《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丁日初、杜恂诚:《十九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陈月清:《洋务运动时期与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改革之比较》(《文史哲》1983年第3期);伊文成:《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及其历史实质——与中国戊戌变法略作对比分析》(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吴廷嘉:《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李廷举:《“和魂洋才”与“中体西用”的比较》(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主要著作包括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初版,1981年修订版);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武安隆、王家华:《日本明治维新》(商务印书馆,1984年);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罗福惠:《国情、民性及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

[2] 主要论文包括吴乃华:《甲午战争与康有为人格观的演变》(《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吕明灼:《康有为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东方论坛》1996年第4期);阎丹红:《对康有为近代化思想的重估——“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1期);房德邻:《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邝兆江:《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汪荣祖:《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崔波、尚新丽:《论康有为〈大同书〉的社会构想》(《南都学坛》2000年第1期);江峰、汪全模:《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等。

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光绪朝朱批奏折》全 120 册，其中就包括一部分与戊戌变法有关的附有朱笔评语的奏折。1998 年，影印出版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其中包括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的全部敕旨。这些数量庞大的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出版，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以 1998 年戊戌变法 100 周年为契机，中国国内有关戊戌变法的研究迎来一大高潮。作为百年来戊戌维新研究的一大总结，1998 年 9 月，《读书》杂志与天则经济研究所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纪念戊戌变法 10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两天的会议中，历史学者、经济学者、思想史家等，围绕着“戊戌变法的历史回顾”、“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戊戌变法和近代文化的变迁及中国知识分子运动”等四个主题，就戊戌变法运动的相关史实、主要人物评价，以及百年以来留下的遗产、影响，和在研究戊戌变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坦率、认真的讨论和交流。

另外，2003 年 7 月 23 日至 26 日，为纪念康有为诞辰 145 周年暨戊戌维新运动 105 周年，在广东佛山市召开了康有为与近代文化学术讨论会。2007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康有为病逝之地的青岛，又召开了康有为思想国际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 45 位学者参加，提交论文 20 余篇。

可是，在这些研讨会上，很少涉及康有为明治日本认识的详细研究。从整体上看，康有为是从怎样的视点切入对明治日本的研究，他是怎样摄取、把握明治日本的改革方案的，同时，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康有为的明治日本知识是如何演变的，这些涉及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的出发点，或者说是中日近代化研究的基础工作，并没有获得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另外，研究的聚焦点主要还是放在相关史实的论证上，对思想史变迁的研究，尚嫌不足。

在日本，对康有为和变法运动研究的代表性论著，首推小野川秀美

的《清末政治思想研究》和彭泽周的《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1]

小野川秀美在《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中，将清末政治思想的主轴规定为洋务论、变法论、革命论的三阶段论，并在这一基础之上，论述清末洋务派的活动和变法论的具体展开。小野川秀美认为，坚持西学与中学的对立，在中学的主导之下维持、强化支配体制，通过引进西洋器械，强化海防，这便是“洋务论”；其后，在以重视内政及将西学附会于中国古典并加以理解的趋势基础之上，将西洋的制度与中国的经书联系起来，并推进内政改革，这就是“变法论”；并且，以中日甲午战争的败北为契机，以康有为为核心的变法派登上历史舞台，替代了势力急剧没落的洋务派。通过这种三阶段论的简明区分，小野川秀美提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种演化模式。

小野川秀美还认为，从洋务运动向变法运动转换，特别是从变法论的成立时期至其顶点的变法运动，也是儒教变革的展开过程。持这种见解的，还包括野村浩一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等。^[2]

彭泽周的《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考察了康有为摄取明治日本知识的渠道，以及与其撰写《日本变政考》相关的日本政治变革的参考资料，以大量的实证素材探究康有为在何种程度上认识、把握明治日本。彭泽周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康有为热衷于学习明治日本，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康有为对明治日本的改革过程，在认识上是很不充分的。

除此以外，言及变法派如何摄取西洋及明治日本知识的论文，还有原田正巳的《中国近代变法论的展开——以中国近代思想与日本的关联为中心》^[3]，伊藤秀一的《近代日本与中国西欧进化论的摄取与展

[1]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みすず书房，1969年；彭泽周：《中国の近代化と明治維新》，(京都)同朋舎，1976年。

[2] 野村浩一：《近代中国の政治と思想》，筑摩书房，1964年；市古宙三：《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

[3] 原田正巳：《中国近代における変法論の展開——中国近代思想の日本との関連をさぐる》，《季刊东亚》6，1969年。

开》^[1]等。这些先行研究，对阐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摄取西洋及明治日本知识的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资料整理、分析方面，日本对新发现、新收集的有关康有为的史料进行认真研读，在网罗新史料的同时，进行新旧史料的严格对比，从批判的视角验证史料的可信性、价值性，从而推进了史料的进一步客观化。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深泽秀男《戊戌变法运动史研究》^[2]、竹内弘行《后期康有为 亡命·辛亥·复辟·五四》^[3]、竹内弘行《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一考察》^[4]、高桥良政《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的动向》^[5]、高桥良政《戊戌政变前后康有为的动向》^[6]、村田雄二郎《康有为与〈东学〉——以〈日本书目志〉为中心》^[7]等。

考察中国和日本有关康有为研究的业绩，可以发现，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思想诸侧面论述变法运动的较多，但在这些研究中，往往暗含着这样一个价值判断，即研究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希望以某种形式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些启迪。与此相对应，对康有为原著文本解读这样最为基本的工作，反而在无形中被忽视。立足于这种问题意识的研究，毫无疑问渗入了研究者的先入之见，这必然造成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探究康有为思想的“意义”或“局限性”，研究的内容也会或多或少带上“批判”的主观色彩，这样的“研究论文”，其客观性、精确性，无疑是要打一定折扣的。

[1] 伊藤秀一：《近代の日本と中国における西欧進化論の受容と展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会报》38、39，1964年。

[2] 深泽秀男：《戊戌変法運動史の研究》，株式会社国书刊行会，2000年。

[3] 竹内弘行：《後期康有為 亡命・辛亥・復辟・五四》，京都大学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京都)同朋舎，1987年。

[4] 竹内弘行：《康有為「日本書目誌」の一考察》，《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哲学)》49，2003年。

[5] 高桥良政：《戊戌政変後の康有為の動向》，日本大学法学部：《櫻文论丛》第52卷LII，2001年。

[6] 高桥良政：《戊戌政変前後での康有為の動向》，日本大学法学部：《櫻文论丛》第47卷XLVI，1998年。

[7] 村田雄二郎：《康有為と「東学」——「日本書目誌」をめぐる》，《东京大学外国语科研究纪要》40(5)，1992年。

研究方法论之争

彭泽周等的研究，立足于明治维新与变法运动的比较研究，在对明治维新的变革给予极高评价的同时，又将这种成果的达成程度作为衡量的尺度，评判变法运动的局限性及不彻底性等。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主要是依托“传统—近代”的坐标轴，研究者站在近代的立场上，以所谓近代化的指标，来测量康有为脱离传统、靠向近代的指数，具体到清末思想史研究的文脉之中，则是考察康有为究竟何种程度摆脱洋务思想而实现变法主张，依旧未能摆脱西洋中心论的磁场。彭泽周等最终是通过比较中日两国接受西洋文化的程度高低、“对儒教思想的拘泥”的有无等，来凸显明治维新和变法运动的根本差别。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简单明了的优点，但它从中国落后于日本这样一种事实关系出发，倒过来去追究落后的根本原因，这本身就融入了不少学问之前的感情要素。如果一味简单地运用这一尺度的话，不仅仅是康有为，全体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人物、思想，均可能陷入被严格批判的尴尬境地。并且，立足于这种问题意识的研究，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将近代以前的日本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看作是具有同一性的。以此为基点，则很容易抹杀近代之前中日两国在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和沟口雄三的中国“基体”论，对这种方法论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和批判。柯文的研究，虽然其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但同样适用于彭泽周等主张的“西欧型近代化=资本主义达成”这样一种中国研究视角。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国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中间，存在三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冲击—回应”、“传统—现代”与“帝国主义”，这三种模式都认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动力来源于西

方，是中国在西洋侵入后受此刺激而作出的反应。事实上，这三种模式可概括为一种：即“冲击—回应”模式。

柯文对这种理论模式深表不满，在柯文看来，这种西洋中心主义的模式，必然将近代以前的中国视为“停滞的”，只是通过西洋的外部侵入，中国社会的变革才得以启动。由此，中国近代历史被解释为西欧近代历史的扩大，中国自身内部出现的一系列变革要素全部被剪裁掉。并且，这种近代化的逻辑，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譬如“变化”究竟意指什么，怎样的变化征兆算是重要的，等等，均被限定在西洋经验之上予以定义，这必然导致从外部来套用、规定中国历史，并势必将关注的焦点仅仅置于那些不是促进就是阻碍“进步”、“发展”、“近代化”与“革命”的历史侧面上。而事实上，在柯文看来，过去的研究，确实也未曾离开过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这种简单化的倾向实际上是把中国丰富多彩的历史景象变成了十分单一的历史画面，在其背后隐藏着单线进化的目的论。柯文对既有的研究成果，其所运用的研究范式和建构的理论模式所隐含的“西方中心观”、“种族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进行了猛烈批判，并力图用中国自身的眼光来看中国，也就是把中国研究置于中国的语境中，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出发来展开研究。

以此为基石，柯文正面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其思想核心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标准来判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重要性；第二，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县、城市，开展区域与地方史的研究；第三，不能局限于精英政治思想史，要把中国社会再“纵向”分为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的研究；第四，运用历史学以外的诸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强调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的结合。^[1]

[1] 柯文：《知的帝国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30页。

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显然受到柯文的启发，与柯文的研究视角有诸多相似、共鸣之处。沟口认为，迄今为止的世界认识是以欧洲为标准而建立起来的，但存在着以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领域，中国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因此，为了从整体上把握真实的中国，必须放弃欧洲标准等既定的判断依据，放弃历史框架或意识形态等，尽可能深入到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去。

沟口进一步指出：日本战后的历史研究，主流是肯定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他无法苟同的。沟口在批判彻底否定洋务派历史地位的“人民革命一元史论”的同时，对小野川秀美以来的洋务、变法、革命的“三阶段论”也提出强烈质疑。沟口强调，洋务运动介于鸦片战争和辛亥革命之间，它主要是通过摄取西洋近代文明来补强自身的文明体系，因此，洋务派和变法派的思想，并不能割裂或使之前后对立，它们具有同质性和前后承继关系。^[1]沟口的这一研究视点，在日本学界形成巨大冲击波。

针对沟口的研究，久保田文次发表了《近代中国像扭曲了吗？》^[2]的论文予以反驳，不过，在政治和思想承继性这一点上，久保田文次与沟口雄三一样，也主张不要将洋务派、变法派、革命派按各自的范畴硬性区分，并僵硬地进行考察。

沟口所提倡的贯穿中国前近代—近代固有思想(基体)的“基体展开论”，是否是一种变相的超时间论的存在呢？另外，在清末思想史研究中，从中日甲午战争后至变法运动，可谓是各种思潮迭出不穷的重要变化时期，如果仅仅将其视为洋务思想的延续，这是留有相当疑问的。但是，不管怎样评论沟口的见解，这种争论本身，进一步开拓了清末中国研究的新思路。

以沟口雄三提出的问题为发端，佐藤慎一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清末

[1] 沟口雄三：《近代中国像に歪んでいないか》，《历史と社会》2，1983年。

[2] 久保田文次：《近代中国像に歪んでいるか》，历史学会编：《史潮》新16，1985年。

知识阶层新的世界像的形成过程。佐藤慎一在其著作《近代中国的知识人和文明》^[1]等中，通过 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阶层的观察视角，勾画出从接受万国公法开始的中国文明开化的过程。佐藤慎一强调历史研究不能简单地用“进步”或“反动”来贴标签，而必须深入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对他们的言说和经历的历史事件，进行内在的理论分析。

佐藤慎一分析的框架，从时间序列而言，少许残留着洋务、变法、革命的阶段性痕迹，但是，佐藤慎一研究的特点是将问题意识内化于各个官僚的内在思想之中，同时，又充分兼顾到同时代整个世界的思想发展体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总体化研究，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由此，佐藤慎一提出了构成清末思想史的三大主要方法模型：第一个是设定洋务、变法、革命的阶段性区分，作为狭义的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而构成的方法模型；第二个是作为传统思想的变貌、重组、解体的过程而构成的方法模型；第三个是作为西洋思想摄取规模扩大、多样化的过程而构成的方法模型。佐藤慎一指出，这三大方法模型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面临日益紧迫的危机，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此外，有田和夫在题为《清末意识构造的研究》^[2]一书中，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意识状况、意识构造的视点出发，解构变革和反变革这一对立图式，从中抽取其共通的意识结构。另外，藤谷博的《近代中国政治思想论》^[3]、大谷敏夫的《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4]、佐佐木扬的

[1]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識人と文明》（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 年）。另外，可参阅佐藤慎一：《鄭觀應について——「万国公法」と「商戦」——》（一）—（三）（东北大学法学会编：《法学》第 47 卷第 4 号、第 48 卷第 4 号、第 49 卷第 2 号）；佐藤慎一：《「天演論」以前の進化論——清末知識人の歴史意識をめぐって》（《思想》792 号，1990 年 6 月）；佐藤慎一：《一八九〇年代の「民権」論——張之洞と何啓の「論争」を中心に》（金谷治编：《中国における人間性の探究》，创文社，1983 年）；佐藤慎一：《進化と文明——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東西文明比較の問題につい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洋文化》75，1995 年）等。

[2] 有田和夫：《清末意識構造の研究》，汲古书院，1984 年。后收录于有田和夫：《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汲古书院，1998 年。

[3] 藤谷博：《近代中国政治思想論》，（京都）晃洋书房，1989 年。

[4] 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汲古书院，1991 年。

《清末中国的日本观和西洋观》^[1]等，对近代中国士大夫的对外认识等问题也是更多地侧重于前近代与近代之间思想连续性的角度，展开深入的研究，应该说，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与沟口雄三的学术趋向相吻合的。

本书的构成框架

有关康有为生平传记的研究，以及对康有为提起的诸改革方案的阐释，并不是本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此，并非要否定这些作业的重要意义，而是这些视角的研究，近年来已取得很大的进展，没有必要过多地予以展开。本书姑且站在新的研究角度，着眼于以前为人所忽略的、康有为思想背后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东西，尽可能通过研究他的关于明治日本认识的言论及实际行动，内在地理解、把握其明治日本观，并重新探讨清末中国知识社会及思想的多元化状况。

本书的构成如下：

首先在绪论中，将论及本书的问题意识、研究动机、相关先行研究、研究方法论之争及本书的构成框架等。

在第一章中，通过严密的实证研究，详细考察戊戌变法运动以前康有为的人生轨迹、当时西洋和明治日本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以及康有为具体接触明治日本思想的实态等。并在考证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与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的内在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康有为和当时清朝的其他官僚和士大夫一样，对西洋和明治日本的了解非常肤浅，在资料的拥有和把握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第一章还进一步分析当时中国思想界“中体西用”论的发展状况，梳理康有为的变法论与“中体西用”论的内在关系，进而指出，康有为

[1] 佐佐木扬：《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

作为传统文化中培育起来的士大夫，在新的历史时期，他虽然认识到了“中体西用”论的严重局限性，并渴望突破，但最终依旧未能实现真正的突破。

以此为基础，在第二章中，具体考察康有为是怎样理解、把握明治日本的，重点阐明康有为明治日本观的核心部分。在康有为看来，明治维新的政治目标是确立“立宪君主制”，改革手段是“急变论”、“全变论”，改革路线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康有为的这种认识，构成了中国人对明治维新认识的原型。但事实上，这一原型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问题，必须进行严格的梳理和反思。

康有为提出的“君主立宪制”决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议会政治，而是中国古代圣人提倡的“下意上通、上意下达”的政治咨询机构。康有为将宪法颁布、国会开设等日本政治制度的近代化看作是明治维新直接导入的，这就完全忽视了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作用，民选议会、民权等近代政治的概念，实际上并没有进入康有为的视野。

“急变论”、“全变论”的改革手段，也并不能概括明治维新的真实全貌。明治维新在激进推动“文明开化”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举国一致”，设定了改革的阶段性和秩序性，为各阶层确立了十分柔软的发展选择。

“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改革路线，反映出康有为只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这一面，这种认识，必然得出两项结论：一是将改革看作是一种“理想的革命”，是指导者设计蓝图向下推进的过程；二是对改革的前途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预测。但事实上，明治维新的改革历程，充满波折和反复，绝没有像康有为想象的那样简单。

在第三章中，实证分析当时日本新闻界、政治家、大陆浪人、日本兴亚团体等对变法运动的反应和评价。虽然他们的中国观并不一致，但对变法运动的反应和评价是惊人的相似。他们对变法运动本身均抱有好感，但对改革运动的过激化、对日本的盲目追随等致命弱点，也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康有为明治日本观的问题。